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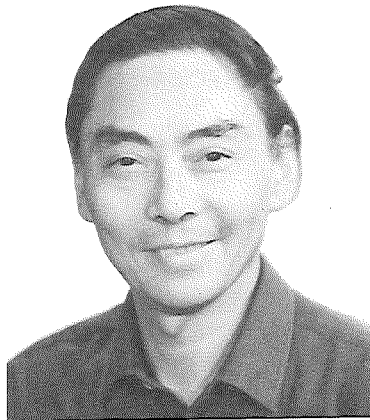
未來總是好的

叶秀山

在哲學界，「哲學有沒有進步」這個問題似乎鬧得最凶。哲學面對「永恆」，討論來討論去，似乎還是那些問題，有甚麼「進步」可言呢？人們不是還在討論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討論的問題嗎？

哲學有沒有「進步」？我看是有的。譬如說，歐洲大陸哲學，二十世紀出了胡塞爾和海德格爾，胡氏直接柏拉圖，海氏直追亞里士多德，前者變革了“ideas”，後者變革了“beings”。至少，這兩位都是把柏拉圖或亞里士多德想說而沒有說好的問題，說得更好了一些。先是胡氏把“ideas”與「理性的直觀」、「直觀的理性」結合起來，但並不是黑格爾的「絕對」，然後又被海德格爾的變革逼到了「生活的世界」，這樣進入與黑格爾迥然不同的現代現象學；而海氏從這個現象學走了出來，進入一個更為深沉的世界——「存在」。應該說，歐陸哲學到了胡、海二氏，西方哲學中「（這）是甚麼」的問題，的確是更明朗、更清楚、更豐富了一些。「甚麼」與「是」，都不是概念性的，而是生活性的，進而「甚麼」和「是」又不可分，知識論與存在論不可分，客體與主體也不可分，而「這」這個「主體（詞）」，原本是與「是甚麼」同一的，這樣，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裏說的道理，不就從「天上」（純思、絕對）回到了地上、人間（生活）來了嗎？

隨着交往媒體的發展，二十世紀以來，多種出版物、雜誌、學術會議等等迅速地多了起來，哲學家不僅用「獨白」的方式去寫書，似乎又可以在更廣泛、更系統的層次上回復到希臘的那種以談話、討論的方式來談哲學問題了。如今，國內的、國際的學術會議越來越多，多種雜誌上也有許多相當重要的學術爭論。這種短兵相接的討論風氣，似乎在英美分析學派那裏開得早一些，但歐陸方面也可以說出一些舉足輕重的交鋒，如早年海德格爾與卡西勒的爭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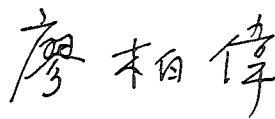
後來哈伯馬斯與伽達默的爭論，以及德里達與伽達默諸人的爭論等等。這種方式是康德那個時代不可想像的。哲學家不光要會寫(大部頭)書，而更要緊的是要會想問題，談問題，討論問題。哲學家從「製作」(大部頭)、「著作」(書、體系)的框框中解脫出來，會是甚麼樣子，古代雖有典範在，但仍要看下一個世紀的實際情形了。不管怎樣，寫書也好，寫文章也好，對話、討論也好，哲學的存在方式是變化了、擴大了、豐富了，參加的人，也一定會更多起來。

未來的情形不可能預測得很詳細。二十一世紀哲學的情形，要看現在的青年人對哲學問題怎樣想、怎樣做。但到底會是甚麼樣子，我們不可能、不必要、也不應該「看得」很清楚。為甚麼？因為，要這樣，只有要他們完完全全地按照我們規定的路子走，才能非常清楚地「預測」到下一個世紀會是個甚麼樣子。而這是不可能的。就我們這一代人來說，對於下一代的事，只要看出一個大概就很好。而這個「大概」是很確定的：下一代肯定比我們這一代更好。那些「更好」的因素，就在「現在」的年青人的身上。我們對於「未來」不可能有十分確切的知識，但卻可以有十分堅實的信念。

葉秀山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

亞洲四小龍經濟發展的 歷史意義



近年來不少學者及評論者都稱譽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發展成就為經濟上的奇跡。若果單從經濟成就的層面來看，這個奇跡並不算獨一無二。戰後德、日兩國的經濟重建也可算是奇跡之一。亞洲四小龍經濟發展意義之深遠在於他們揭示了一條發展路向，而這條道路是一般第三世界國家都可以遵循的。

在四小龍於70年代年經濟起飛，引起世人注目之前，世界上經濟發達的國家除了日本外，都是歐美或是白種人的國家(如澳、紐)。這些國家，除了少數細小的歐洲國家和由白種人殖民開發的國家如加拿大、澳洲和紐西蘭外，都有一段不光榮的帝國主義歷史。就是因為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經驗和帝國主義和